

# 近代报刊对年鉴发展的影响

陈郑云\*

**摘要** 20世纪前期,是近代中国年鉴发展的奠基时期。通过考察近代报刊对年鉴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近代报刊在年鉴发展与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即近代报刊不但成为年鉴编纂理论的争鸣阵地,也是年鉴编纂进度的公告窗口。同时,近代报刊为年鉴评论提供了舆论空间,报刊上发布的年鉴书评、新书介绍、广告词等是商业化语境下年鉴批评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 近代报刊 年鉴编纂 相互影响

清末民初,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年鉴是1909年奉天(今沈阳)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中国人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是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了《世界年鉴》。从1922年上海银行周报社《银行年鉴》、北洋政府《外交年鉴》的出版,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现第一个“年鉴热”,单就刊行数量而言,1934年是近代中国年鉴发行的巅峰之年,该年一般被称之为编纂出版上的“年鉴年”,<sup>①</sup>至1949年已编纂出版八十多种年鉴。年鉴事业已初具规模:编纂的年鉴分为综合性、专科性、地方性和统计性四大类型;编辑方式由早期的翻译摘编,到编纂出多体裁、多功能的综合性年鉴;编辑出版单位既有内政部、外交部、政府等官方机构,又有申报社、商务印书馆、银行周报社、新亚书店等新闻出版单位,可谓年鉴史上的奠基时期。<sup>②</sup>

近代中国报刊的兴起,不仅吸引了传统士绅,而且波及普通民众,报刊的大众化加速了精英思想的传播及其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在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不断适应中国国情并逐渐形成自身特色的历史进程中,报刊与年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近代报刊不仅为年鉴的发展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对象及广大读者群体,而且报刊中“新闻”“专栏”“书评”“广告”等多样化的栏目也成为影响年鉴发展的载体。同时,报刊的开放性也可以吸纳群体与个体参与年鉴活动,以报刊为媒介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推动了年鉴的创新发展。基于

---

\* 陈郑云,男,甘肃省陇南市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年鉴学。

① 方书生:《中外交融下近代中国年鉴的生成与演化(1846—1949)》,《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② 肖东发:《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55~65页。

此,笔者拟通过分析近代报刊对年鉴发展的影响,揭示近代报刊在年鉴发展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 一、理论与方法:近代报刊是年鉴编纂研讨的重要阵地

伴随着年鉴编纂的热潮,年鉴学者以报刊为平台,围绕年鉴的源流、年鉴的性质、编纂宗旨、编纂方法、组织模式、撰述内容及体例等展开了一系列年鉴理论与编纂方法的讨论。首要问题是为什么要编纂年鉴,有学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年鉴何为而作也?曰:网罗散失旧闻,整齐故事,以资历年之比较,以供平常日用之参政。……批阅前编,见诸业陵夷,江河日下,追溯往事,不堪回首,又诸同人,或有论著,检寻史迹,殊不易得,有斯两感,乃作此编,命名‘年鉴’,并非表彰功烈,藉以自艾艾人,自便便人耳。”<sup>①</sup>可见,年鉴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资历年之比较”,二是“供平常日用之参政”。

关于年鉴编纂的体例,有学者指出:“体例是任何著作的基础,尤其是这一类的巨著,更非有完善的体例不可”,这里强调了年鉴体例的重要性。而年鉴取材“宜先就公家刊物或案牘中采取,公刊不足,则益之以私人之著述报告,或采访调查,均应分别注明出处,遇有疑窦,并可互相印证。或注明互见之有同异,以俟后来考订”;“原以编次某年份或某年度为主,但本届既属并刊,以往事实,似宜因流溯源,一并记录,庶几首尾贯穿,但就时代关系言之,当然详于近而略于远,其过程中发生特殊事项,又当别论”。既然前已论述年鉴具有鉴往察来的作用,因此统计数据就非常重要:“历年统计有数字可载者,自应广为搜集,以见先后比较,其关系较微者,不妨择其中之最高年度及最低年度为标准,或画其时期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取一平均数为标准,或取一定之某某年为标准,例如取逢五逢十之年度”;“各项统计材料,难免层次,宜注明年度或年份”;“每一门类,宜就客观立场,以记述文字,述其创成经过以及现状,而后附以统计图表”。年鉴行文宜“采用近现代浅显文言,并施句逗,以便诵读”。<sup>②</sup>如此论述,说明当时年鉴编纂者已经认识到年鉴行文需要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1935年,“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为宗旨的《新广东》期刊在《广东年鉴》启动之际,刊发专文指出编纂背景:“查本省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及社会一切现状,为省内外人士所欲知者,至为繁颐。零篇断简之记述,虽所在多有,求其萃于一编,统系厘然者,尚付阙如。”正因如此,广东省政府,“拟博访周咨,哀集材料,分别部居,依类詮次”,启动编撰《广东年鉴》,以供参考。为编纂年鉴,先行组织成立了“广东年鉴编纂处”,专门负责编纂工作。年鉴编纂的工作程序,“由全体编纂员公推数人分别起草年鉴部门纲目,经汇合审查决定后,依部门分组编纂,各自认定担任其组工作。每一部门编纂完成后,各组变换审查,由本组依审查意见修改完妥,全部完成后,每组推出一人,合组审查组,会合审查,为最后

<sup>①</sup> 西耕:《年鉴何为而作也》,《实业杂志》1933年第182期。

<sup>②</sup> 易天爵:《青岛经济年鉴之编纂》,《都市与农村》1935年第15期。

之决定”。对于编纂的材料亦有明确的说明：“除各编纂员自行搜集外，有须向外征集者，由省府秘书处或设计委员会征集之。现经草具广东年鉴类目初稿及编纂处组织大纲，送请省政府核示，并经省府通令所属各机关遵照办理。将来本书完成，则本省所有一切之现状，均能一目了然，不独政治经济之建设，有所依据。”明确编鉴旨在“三年施政计划之推行，亦不无小补也”。对年鉴的编纂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将本省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及社会一切现状，为系统的记载。每类记述，以本年度事实为中心，过去沿革，及预定计划，每于项开端结束叙述之。文字叙述，以统计为实证，统计表格，以文字为说明。初稿只举类别纲要，其节目由分类编者依材料自定。”<sup>①</sup>对年鉴编纂方法的论述，既具有广阔视野，又具有实践意义。

基于年鉴的“参政”功用，有学者面对当时的局势提出编制西北年鉴的设想，认为“国家多事，西北顿现荒凉。迺者国防不固，边圉阡危，东北忘而华北寒，华北危而西北可虑，一旦瓠脱，后患将不堪言。国人有鉴于此，倡言开发建设，二三年来，大有进步，卫诸未雨绸缪亡羊补牢之意，犹不无可为也”。在开发建设西北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西北各省之实际情形，意像多有模糊，非誇言过实，即恒加贬斥，从事於西北研究工作者，亦类多辗转相抄，獭祭是赖，不徒无以释国人之谜，且甚多以辞害义以讹传讹之害”。所以，编制《西北年鉴》被提上日程，可以“对于西北各种事实，作系统之记载，藉以唤起国内有知识有财力之人士，明瞭西北实际状况，进而从事於建设之实际工作，兼以备执政者鉴往知来之具，洵为切合需要之工作”。也指出了编纂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确定西北界限、偏重实际材料、注意调查工作、宜有专门设计。”<sup>②</sup>这样基于编撰西北年鉴的认识，显然是借助历史之“鉴”，编辑现实之“鉴”，以为将来之“鉴”。

针对年鉴源流、编纂宗旨、编纂方法等问题，张绚指出：“年鉴之辑，在中国仅念余年间事。以其编制较易，而功用殊大，故能于一短短时间内，渐见普遍。惟视年鉴为历史学之一门而加以分析研究者，或因兴起之日尚浅，迄尚未之前见……”可见，他认为年鉴是“历史学之一门”。故而，将年鉴大体分列两类：“甲，以某一区域为限，因地方之不同而异者；乙，以某一事业为业，因性质之不同而各异者。前者可谓为一般性的年鉴，如过去之湖北省年鉴、广西省年鉴及最近出版之三十五年上海市年鉴是；后者可谓为专门性年鉴，十八年及二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年鉴及财政年鉴教育年鉴等之类属之。”张绚的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了解当时年鉴编纂情况，进而又从文献学的视角，对年鉴编纂进一步诠释：“年鉴为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史料，其与一般性史料之差异处，则在于年鉴系有时间性（一年）的与地域性（一地方）的史料整体。因是之故，年鉴之编制，于其‘存史’之意义外，尚有‘致用’之意义在焉。”同时，强调了编制年鉴的重要性：“自横的方面言之，年鉴为一地方一年之内史料整体。而自纵的方面而言之，又可汇年鉴各种资料而为一地方史之完整史料，若更推而广之，则各县之年鉴可汇为一省地方史之完整史料，各省之年鉴复可汇而为

① 佚名：《派员编纂广东年鉴》，《新广东》1935年第26期。

② 佚名：《论编撰西北年鉴》，《西北向导》1936年第17期。

一国之国史史料。所谓‘年鉴发轫于地方,而后综合于全国,参加于世界,则繁简详略,皆不能先其已确性’是也。”他认为年鉴编制程序需要经历“拟目、采集、整理、编纂”四个阶段,年鉴编制时需要注意“四务”,即“务博、务要、务实、务变”。<sup>①</sup>张绚的年鉴编纂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针对专门文艺年鉴的编纂,有学者认为:“编辑文艺年鉴的目的,应该是给读者系统地详细地明了一年来文艺界的情况,所以,它的性质应该注重文坛的各种有系统的详细情报,而不注重作品的选录。因此,编辑文艺年鉴的态度,应该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提供史料的而非取舍作品的,普遍的而非代表的。这是编辑文艺年鉴的两大要点。”<sup>②</sup>这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文艺年鉴的编纂认知。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年鉴编纂者以报刊为载体,围绕年鉴源流、编纂宗旨、编纂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的研讨,为年鉴编纂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近代报刊在促进年鉴编纂理论的创新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中国年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二、动态与进展:近代报刊是年鉴编纂进度的公告窗口

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信息媒介,不仅为年鉴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还为年鉴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是反映年鉴编纂动态的重要依据。年鉴编纂机构或编纂者也逐渐意识到报刊可以促进年鉴事业发展,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报刊出版与年鉴发展过程中。因此,近代报刊成为年鉴编纂动态发布的绝好平台。

### (一) 发布征稿通知

年鉴编纂机构通过报刊向社会各界发布征稿通知,以提高材料征集工作效率,有利于编纂工作顺利推进。例如,《新闻报》刊发中国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调查公告:“自登报征文后,各地研究电影艺术者,向该会面索或函索目录,甚形踊跃,闻该会为获得一九三三年中国电影界之真实情况期间,凡与电影艺术有关之公司、团体、戏院、报章、杂志、书刊、学校、商店以及从事电影之个人,均可向上海博物馆路十九号内四百二十五号该会索取登记表格,或自将详细现状及照片等函寄该会,荟登年鉴而免遗漏。”<sup>③</sup>又如,《民国日报》发布:“现拟编制《工商年鉴》,请转饬各地实业机关,征集关于工业商业及劳工调查统计之图表,照其他各种年鉴材料,统令于民国十八年二月底前,具报到部,以备编订等由。”<sup>④</sup>再如,《申报年鉴征求新材料》:“申报馆出版之《申报年鉴》,搜罗最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种种材料,而为扼要之记述与统计,由专家汇编付印,以供各界实用上之检查。创刊以来,已出三册,风行全国,阅者称便。兹值该书第四次改编,该馆年鉴部为改进起见,除向各团体机关

① 张绚:《略论年鉴之编订》,《安徽文献》1948年第4卷第5期。

② 柳风:《也谈谈文艺年鉴》,《新垒》1933年第2卷第4期。

③ 佚名:《中国电影年鉴编委会开始调查及登记》,《新闻报》1933年11月18日,第20版。

④ 佚名:《工商年鉴征材料》,《民国日报》1928年11月21日,第10版。

广征精新材料,并请知名专家分任撰稿外,深恐尚有难周。特广事征求,如各地人生能供给私人研究之材料,及对该书已出各册有所补充、改正,或于编制上有所指述者,申报年鉴社均表欢迎。”<sup>①</sup>由此可见,年鉴编纂机构以报刊为依托,发布征稿通知,有助于加快材料收集进度,推进编纂实践。

## (二) 通报编纂动态

伴随着年鉴编纂工作的开展,报刊成为年鉴编纂机构向社会通报编纂动态的重要窗口。民国五年(1917年),《政治年鉴》编纂告竣后,即在《新闻报》通报《编辑政治年鉴之大纲》曰:“民国五年政治年鉴,业经总统府秘书厅编成,‘大事记’分门别类,甚为详细。其纲目大致如下:(一)交涉情形、(二)内政兴革、(三)海军整顿、(四)陆军计画、(五)财政状况、(六)司法近情、(七)教育制度、(八)实业方针、(九)交通办法、(十)蒙藏历史、(十一)官制改革、(十二)地方事务、(十三)国会成绩。闻此项年鉴编就后,除交国会外,逐日登载公报,宣示国人云。”<sup>②</sup>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筹备编辑《蒙藏年鉴》工作启动后,《新闻报》发布编纂动态:“中央社二十六日南京电:蒙藏会筹备编辑《蒙藏年鉴》,分两期办理:(一)搜集材料;(二)决定体例既编辑事宜。已派郑实善等十余人负责搜集材料。”<sup>③</sup>再如,《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对新近年鉴的编纂动态进行通报:“(1)《经济年鉴》——实业部编纂,现已设立编纂委员会,聘请经济界名人24名为委员,并推定三人位常委云……(2)《劳动年鉴》——实业部组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李平衡、李武乔等七人为委员,指定李平衡为委员长,李武乔为编辑主任,以开始工作。(3)《教育年鉴》——教育部编制、编纂委员会久经组成,并已制定各种况要目、调查表格、及呈送事项一览等,分别令发各省厅局学校图书馆等,限期填报,以冀材料齐集,迅予编竣出版云。”<sup>④</sup>再如,《行政效率》期刊亦及时关注年鉴编纂情况:“新近中央各机关均注意年鉴之编辑,除实业部之《经济年鉴》、教育部之《教育年鉴》已出版外,《内政年鉴》及《财政年鉴》亦在进行中,兹特关于两年鉴消息余后:《内政年鉴》,内政内政年鉴编纂委员会自上月成立以来,编辑工作极为紧张,在内部各司自动办理缮写绘图之外,现正向各省调查关于民政、警政、地政、礼俗等情况,此项工作因得各省政府之努力呈报进行,甚为便利,预计本月底前可缴第一次总稿云;《财政年鉴》,财政部为使外间明瞭国家财政情形起见,特发起编辑财政年鉴,已由财次秦汾会同秘书参事及司属主管人员,组织财政年鉴编纂委员会,该会于二十二日上午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讨论年鉴编纂纲要及支配工作人员与搜集材料等项,闻已有所决定云。”<sup>⑤</sup>这样,年鉴编纂机构通过报刊与社会建立起联系,及时向公众通报编纂动态,以便社会公众了解进展情况。

① 佚名:《申报年鉴征求新材料》,《民报》1936年1月28日,第8版。

② 佚名:《编辑政治年鉴之大纲》,《新闻报》1916年12月4日,第5版。

③ 佚名:《筹编蒙藏年鉴》,《新闻报》1934年9月27日,第5版。

④ 佚名:《编纂年鉴之好音》,《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

⑤ 佚名:《年鉴之编纂》,《行政效率》1934年第7期。

### (三) 综述编纂得失

针对年鉴编纂情况,有学者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发表对年鉴编纂总体情况的综述:“年鉴之编纂,在先进各国,极其发达,有汇志一年来全国之概况者,有专志政治者,有专志经济者,有专志实业者,有专志出版或新闻者,言其类别,更仆难数。惟我国近年学术荒落,年鉴之书,亦难持久。除商务印书馆曾做昙花一现之《中国年鉴》,未见续出外,案年发行者,惟字林西报,主编之英文本《中华年鉴》(英名 *China Year Book*)而已。去年大东书局虽有《世界年鉴》之编,而分量不称,名未附实,即其中本国材料,亦率稗贩他人,复多踏讹;学术如此,何怪物力之不竞”,“本国内编修年鉴者,颇有风起云涌之观”。<sup>①</sup> 这里已对年鉴的种类有清晰的认识,即综合型年鉴与专业性年鉴,指出“学术荒落,年鉴之书,亦难持久”,可谓切中要害。又如,《光报》发布《谈年鉴》一文综述年鉴编纂得失:“世界各国,考察一国的文化盛衰,打从年鉴入手,普通日用常事年鉴之外,专门年鉴,种类甚多,专门之外,还有个地方的年鉴。中国年鉴首先出版的是《世界年鉴》,民国二年发行,用七号字排印,金慰农主编,金是留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主《民声日报》笔政。内容不错,销行甚少。商务印书馆可算最大书店,出的《中国年鉴》,挂一漏万,颇不高明,远不及《上海指南》。《申报年鉴》比较的差强人意。徐蔚南的《上海市年鉴》,煌煌巨帙,因为通志馆的资料,历史性占去一半,已是不可多得。地方年鉴,只有《东北年鉴》一本,搜罗丰富,可惜出版的一年,就逢‘九一八’,从此夭折。华东通讯社最近发行的《上海年鉴》,奄有《上海指南》《上海年鉴》之长,适合参考。”<sup>②</sup> 诸如此类的专论,评述年鉴编纂的得失优劣,多出自年鉴编纂精英之手,概念清楚,论证有力,厘清了年鉴发展的历程,也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指引年鉴编纂走向规范化之路。

## 三、书评与广告:近代报刊是年鉴批评的重要园地

### (一) 报刊书评——专业化的年鉴批评栏目

书评是在近代报刊兴起后才逐渐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类,是了解学界动态的重要渠道,更是学术批评的重要模式。随着年鉴的出版数量逐渐增多,年鉴学者选择什么年鉴来“评”,则说明对该年鉴的认识与赏评,这里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批评。作为一种作者和读者之间对话的文体,书评介绍或评介新书意味着对于学术的品鉴,而年鉴书评中的“评”则是研究年鉴的重要依据。近代报刊上关于年鉴书评栏目有的直接名为“书评”,有的称“图书评介”,有的叫“图书介绍”,旨在通过评论新近出版的年鉴来向人们介绍年鉴动态。如《银行周报》刊发《介绍〈全国银行年鉴〉》,首先考察“我国银行业,自萌芽发起,迄于今日,为时不过四十年,其所成就,虽不能与具有数百年历史之欧美银行业并驾齐驱,然在我国各业之中,固不失为大企业之一。尤以近年来农村经济破产与银行业之

① 佚名:《编纂年鉴之好音》,《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

② 小卒:《谈年鉴》,《光报》1947年9月14日,第2版。

关系,更为论者研究之中心。惟以其中关系之复杂,范围之庞大,统计数字之缺失,实令研究本问题者,有无从下手之叹”。因有鉴于此,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先有‘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状况研究’之刊行,近又有‘一九三四年全国银行年鉴’之编制,费时达一年之久,始于六月三十日准期出版,全书计一千八百页,计正副两编,共十五章,都二百五十万言,举凡最近三年银行大事述略、全国银行总览、各地银行调查、银行公会、银行法规、银行统计、银行人名录、银行日志、外商银行、钱庄与银号、信托公司、银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与典当等之记载,均极详备,允为银行业之空前钜制。该书用米色道林纸、汉文正楷排印,硬面精装一巨册。定价八元。每章另贴布纹纸目录,编辑醒目,检阅便利,尤为该书之特色,研究经济及银行学者,自得此编,无不视同拱璧云”<sup>①</sup>。这样的年鉴介绍,厘清年鉴源流,分析编纂特色,进而达到市场推广的效果。又如任先在《读〈南洋年鉴〉后》中指出:“《南洋年鉴》一书,果然巨帙”,“年鉴编纂须具备巨大之财力精力,更赖有充裕时间,东西洋各国每年咸有专门负责之机关,聘请专家,广搜材料,精密编校,岁耗巨资。吾国年鉴除商务印书馆、申报曾出版数度外,尚无正式按年刊行者,可想其产生之不易,南洋商报主持者竟能籍少数人之力量,十阅月之时间,创此巨著,使后之欲研究南洋情形者,不患无根据资料,宁非快事。此书总分五篇,凡百余章,达二百数十万言,首四编以地域为区分,详述其地理、历史、居民、风俗、政治、国防、实业、教育、金融、交通,附以旅行为指南……条分缕析,广博精微,诚为吾国对南洋最有系统最完备之记录。读此书,对南洋山川之形势、气候之良宁、土地之肥瘠、政体之组织、社会之设施、物产之种类、工商之状况、贸易之消长、风土之变迁,均可明其概要,实足以推荐任何关心南洋之国人。”<sup>②</sup>此类年鉴评论,非常精准到位。再如王全章在《甘肃统计年鉴述要》中指出:“惟本省统计事业,尚无基础,致材料之收集倍感困难。统计年鉴之编制,在本省尚属创举,过去既无成规可循,基本材料,又复零乱散漫,或追溯过去,或重行估计,分析抉择,煞费周章。爰就全部材料舍繁就简,经半年来之搜编,择其重要而资参著者,编成第一辑《甘肃统计年鉴》,原编材料来源,大抵以本府各厅处主管之实际业务资料为主,其他有关机关及学术团体专家估计之资料为辅。编制体例以国民政府主计处颁发之省政府公务统计方案之纲目表为主,依照实际情形,并参考各省市之统计报告自行拟订之表式为辅。材料时期,以最近之材料举详,较远之材料从略,次级材料较多,原始材料较少。全编总计一十六类,四十八纲,一百七十八表,凡本省社会、经济、政治、自然,各方面之数字,或详或略,大体均有刊载。”<sup>③</sup>还有《新闻报》刊发题为《美术年鉴评介》的“书评”称:“全国各美术团体的历史,探源溯本,和它的事工,详尽地披露。一千五百多美术家传略和师承,把他们的年岁、籍贯和经历,也分别的著述,不只是给现代研究美术的知道作家的来历,就是将来修美术史,也有所根据。”<sup>④</sup>《社会日报》刊发题为《申报年鉴之缺点》的“书评”称:“《申报》以六十年纪念,有

① 佚名:《介绍全国银行年鉴》,《银行周报》1934年第18卷第27期。

② 任先:《读〈南洋年鉴〉后》,《民锋》1939年第1卷第2期。

③ 王全章:《甘肃统计年鉴述要》,《新甘肃》1948年第2卷第2期。

④ 李新:《美术年鉴评介》,《新闻报》1948年12月2日,第7版。

《申报年鉴》之印行,内容详密,包罗万象,确为最完备之参政书。不过对于本埠年盈亏、各种手续、各家之利率比例,都系一般人之所亟欲知者,殆以不易查考欤,是乃美中不足也。”<sup>①</sup>这些近代报刊上发表的栏目化的年鉴书评,或曰“编辑醒目,检阅便利”,或评“条分缕析,广博精微”,或论“或详或略,大体均有刊载”,或言“美中不足”,兼有导读和评论两种效用。或许因作者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对新出年鉴的评论或许未必精准,但从中仍可观察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视野下的年鉴发展大势。

## (二) 报刊广告——被忽略的年鉴批评资料库

随着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出版物日益丰富,一些出版机构为了打开图书销路,发布了大量的图书广告。年鉴编纂机构亦是如此,通过广告来宣传年鉴的优点,以刺激读者的购买欲。当时的著名《申报》《新闻报》《社会日报》《铁道》《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等报刊都有繁多的年鉴广告内容。诚如戈公振所言:“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sup>②</sup>年鉴广告的直接目的虽是为了促销,但既然要宣传营销,就不得不围绕年鉴的编纂背景、主要内容、编纂特色、资料价值作一番评论,故而年鉴广告在商业化语境下仍流露出较强的年鉴评论信息。如《华年》“广告词”介绍《财政年鉴》指出:“对于我国及他国之财政有极详尽之记载,且条例井然,甚有系统。全书计共十五篇,凡二百八十万言,第一篇为财政概况,第二篇为财务行政,第三篇为会计,第四篇以下为关税、盐税、统税、国债等篇,盖就实际情形及组织系统以为编次之根据者也。取材以档案文书为主,而各种关于财政之法令规章,皆附于各篇之末,洋洋大观,具见编纂之苦心与毅力,否不能在短期成此浩大之工作也。”<sup>③</sup>又如《京沪杭甬铁路日刊》“广告词”介绍《铁道年鉴》曰:“内容丰富,体裁完整,共一千余页。此外附录则有乘车游览指南、世界铁路概要、中华民国铁路普通货物分等表等。令编索引,翻阅至易。印刷颇为精美,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每册大洋五元,平装每册大洋三元。该会现正筹划续编第二卷云。”<sup>④</sup>再如《铁道》“广告词”介绍《平汉年鉴》曰:“铁路年鉴,在欧美各国多有刊行。盖在搜集路务实况,为鉴往思来之用,亦为科学管理筹谋改善之根据焉。我国各铁路对此种年鉴之编纂,虽明知其重要性,顾以数十年来,时局机惶,路务废弛,补苴不遑,宁语其他。所谓铁路年鉴,终未一见,各路情况如何,局外人固无从悬测,即局内人亦不甚了了,不可为非憾事也。”这样追溯铁路年鉴发展简况,论述编纂铁路年鉴的必要性,最后评论《平汉年鉴》创刊“实为我国铁路界破天荒之富有价值刊物”,“内容事实上已将平汉铁路二十七年来之迁嬗,尽行概括,成为不可磨灭之史料,足为其他各路之矜式”。<sup>⑤</sup>还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广告词”介绍《财政年鉴》“特点”时,从“内容完整”“材料精确”“专家合编”“应用广博”四个方

① 佚名:《申报年鉴之缺点》,《社会日报》1933年2月4日,第1版。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③ 唐庆增:《介绍财政年鉴》,《华年》1935年第4卷第49期。

④ 佚名:《介绍铁道年鉴》,《京沪杭甬铁路日刊》1933年第708期。

⑤ 志政:《介绍平汉年鉴》,《铁道》1933年第3卷第6期。



面高度概括了该年鉴的编纂特色。<sup>①</sup> 这些广告词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可以看出注重通俗易懂和短小精炼,受众面也更广泛,是年鉴知识与编纂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联系当时年鉴发展现状来看,这些图书广告与推介,已然超越了商业化宣传的范畴,折射出图书广告在连接年鉴与社会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从笔者目前所翻阅的报刊来看,年鉴广告的数量可观,可看作是丰富的年鉴评论资料库,反映了早期年鉴编纂的状态和风貌,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研究材料。

综上所述,20世纪前期,在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不断适应中国国情,逐渐形成自身特色的历史进程中,报刊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年鉴的迅速发展,多与报刊所起到的媒介作用紧密相关。近代报刊是年鉴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及时传播年鉴的一种重要形式。报刊既为年鉴学者们提供了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和了解现状的机会,也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台。年鉴研究成果与编纂动态资讯的及时发表,并很快得到反馈(包括对年鉴的介绍、评论或广告),其双向互动而导致的辩论对年鉴发展的意义尤为重要。近代报刊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年鉴发展的状况和走向,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较为充分的史料。

责任编辑:冷晓玲 朱海

---

## 《公法年鉴》

《公法年鉴》创刊于2014年,由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每年1卷,主要登载与公法相关的研究课题论文,并优先供苏联解体后各国家行政法规领域的专业人员使用。该年鉴为“促进中亚国家法制”项目而创作,获得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资助,并由德国国际合作公司(GIZ)实施。该年鉴涵盖所有与公法相关的课题,尤其在行政法规领域。《公法年鉴》专门针对公法领域的实际趋势编著,从比较法的角度反映公法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定位于作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工具,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规具有重要影响。部分论文选自每年九月举行的行政法国际科学实践会议。

(摘编自《国外年鉴选介》 张恒彬主编)

---

<sup>①</sup> 唐庆增:《介绍财政年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5年第159期。